



莫维斯线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研究



李 意 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 要：以莫维斯线为焦点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已有九十年的历程。本文从中国旧石器早期工业特点的探索、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和区域性特点成因三方面进行了回顾与思考，对手斧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认识。

关键词：莫维斯线；手斧；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in China which is focused on the Movius Line has been ninety years. We review and consider it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hic indust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 and East as well as the reasons of regional pattern.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the handaxe problem.

Key words : Movius Line; handaxe;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以 1920 年桑志华在甘肃的发现作为开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已走过整整九十年。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工业特点的探索也经历了几代人的辛勤耕耘。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从 200 多万年直至 13 万年左右，包括早、中更新世。近年来早更新世遗址在中国发现增多，但有些仍存在争议。不过，新的发现已可把中国最早的人类文化至少上溯至 160 万年。中更新世时，古人类活动范围大大扩展，在中国大江南北都发现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这个阶段是直立人和早期智人共同生活的时期，他们所留下的大量遗存为我们认识远古人类的行为活动和生存策略提供了载体。

一、中国旧石器早期工业特点的探索

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工业特点的讨论和探索，实际自桑志华、德日进、步日耶和布勒等西方学者在水洞沟和萨拉乌苏遗址的工作时就已开始，此时的认识几乎完全基于欧洲旧石器文化背景。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尤其是 1930～1931 年发现大量石器，才真正面临思考中国旧石器时代石器工业与西方

旧石器工业之间关系的问题。1932 年，裴文中和德日进在北京猿人石器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猿人的石器是粗大的砾石石器与细小石器并存，不见手斧。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是中国境内真正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化，它是这个典型地点以外未见报道的一种旧石器文化。特别提出不见手斧，可见当时是以欧洲的石器工业来对比的。在旧石器研究刚刚起步，如何认识中国所发现的石制品是当时的首要问题。裴文中曾说道，“关于中国和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是目前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然而目前还不可能解决，因为至少还存在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1. 欧洲史前人类主要工具的类型特征及其分期，尚不见于中国。2. 一种文化的发展，经常是具有地方性的。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人种和差异很大的文化。”他认为中国猿人的石器文化无法与欧洲的阿布维利文化进行比较，两个文化的加工方法没有类似之处，主要应该根据文化的地质时代来对比欧洲和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尽管这是当时对西方旧石器文化的认识，但是他比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有别于西方传统。1965 年，裴文中重申：“至于中国石器时代同西欧的对比，在世界学者

中有着各式各样的意见。作为基本的方法问题,我们主张不要从石器形态的类似上着眼,而要用地质学的根据来进行对比”。

随着西侯度、公王岭、匭河、观音洞、大荔和丁村等一批遗址的发现,以北京猿人遗址为基点,开始尝试了解北京人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国旧石器内部的区域性文化和技术传统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文化的概念,如“匭河文化”、“观音洞文化”、“丁村文化”。

1972年,贾兰坡等提出了中国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两个系统学说,即是“匭河——丁村系”(又称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和“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又称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把中国旧石器文化从早至晚分成了两个平行发展的区域。这个学说一直就有很多评论和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根据目前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资料,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存在两种独立发展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我国境内存在着特殊的以石片工具为主的小石器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南北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

不过,在1978年的西侯度报告中,贾兰坡和王建先生也认为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基本上都属于石片文化传统。“公王岭蓝田人可以归入石片文化。匭河遗址石器中石片具有使用痕迹,刮削器、小尖状器和三棱大尖状器是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只是砍砸器用砾石加工的较多。西侯度遗址,从整个组合看,也是向器身一面打制的多。北京人石器更是以石片为主。”其后,邱中郎和李炎贤先生在总结中国旧石器工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旧石器文化有自身的发展特点,属于石片石器工业。石片和以石片为毛坯加工的各类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居重要地位。

1989年,张森水讨论了北方旧石器早期遗址的文化序列与发展趋势以及文化关系与类型。认为北方旧石器早期文化具有多样性,至少存在三个文化类型:第一文化类型以小石器为主或叫以北京猿人文化为代表的文化类型。是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主体文化类型。第二文化类型以大石制品为主,以庙后山遗址为代表。第三文化类型为石器文化类型,以四道沟地点为代表。他将原划为大

石器系统的匭河遗址和公王岭遗址改划到小石器文化传统里。但仍主要以石器的大、小作为文化类型的划分标准。其后,他又将北方旧石器早期文化分为北京猿人工业和四道沟组合。提出北方存在以一套直接打击的、以小石制品为主的跨时代的多个组合所构成的一个主工业。

南方地区旧石器早期遗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仍以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的资料最为丰富。70年代的试掘后,贾兰坡就认为它与华北地区的关系比较疏远,可能属于另外的一个系统^①。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南方早期旧石器文化的大量发现,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南方旧石器早期工业特点的认识。1990年,房迎三将南方地区归于砍砸器传统^②。1991年,黄慰文等将中国南方砖红壤中的石器工业称为卵石具业,并概括了其工业特点^③。张森水也提出了旧石器工业类型存在中国北方和南方两大主工业和多个区域性工业类型。北方主工业在早、中期位于秦岭以北,晚期遍布全国。南方主工业广布秦岭以南,从70万年至旧石器晚期^④。

随着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进行了文化类型的划分,认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区域性特点。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可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在两大区内又各有不同的亚区,不同的大区和亚区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同时又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南方地区东部亚区河流阶地上发现的砾石石器工业与北方的南部相近,西部亚区洞穴内发现的石片石器工业则与北方北部的发现更接近^⑤。也有学者系统地比较与西方旧石器文化技术模式,林圣龙以Clark划分的五种技术模式为基础,认为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显示了特殊性,中西方整个旧石器文化属于不同的传统。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属于模式——技术^⑥。

西方学者对中国旧石器工业也提出了看法,如Clark认为砍砸器文化传统这个词已经过时,最好称为Core/flake complex^⑦。Schick等把中国旧石器早期文化称之为simple Core and flake tool^⑧。目前,石核——石片工业(Core and flake industry)作为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认识被很多人所接受。

二、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东西方关系的讨论

对旧石器时代早期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一直伴随着中国旧石器工业特点探索。自周口店第1地点的发掘,对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与西方旧石器文化的认识就有不同意见。裴文中认为难以将中国和欧洲的进行对比,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石器制造技术有很大的不同^⑩。德日进也强调:东亚“给人的印象是,它一直是一个孤立的和自给自足的地区。它拒绝了任何重大的人类迁徙波浪”^⑪。不过,布日耶在中国考察后,曾发表过意见,肯定周口店有用当地石灰岩粗制的手斧。他还将周口店工业与欧洲石器对比,认为周口店工业有许多特点只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有,如修理台面技术、用两极技术产生的小石片以及雕刻器和小石钻、石锥等。对此,裴文中认为这只是后期北京猿人石器制作技术有了显著提高的表现,但上、下层的石器基本性质相同,而布日耶片面强调了这种进步性质^⑫。

谈及中西方旧石器早期关系的论争,不可避免的是著名的“莫维斯线”。1944年,莫维斯参加了美国东南亚考察团,基于获得的数据,提出东西方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存在显著差异。“远东缺少典型的西欧序列,现在已经清楚:从旧石器初期开始,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按不同生长模式独立发展的石核工具文化”。他认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早期居民制作并使用简单粗陋的石核工具,如单面砍砸器和双刃砍砸器(choppers-chopping tools),而在西亚、欧洲和非洲地区,同一时期的人们拥有更为先进的生产工艺,打制复杂的石核工具,比如手斧和薄刃斧,制作工具的石片也产自预制的勒瓦娄哇石核^⑬。这也被称为两个文化圈学说,即东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为“砍砸器文化圈”,而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半岛为“手斧文化圈”。这条线被名之“莫维斯线”。

这个学说在当时就对中外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影响至今。其后关于东西关系的讨论基本上焦点集中于“手斧”,最后落脚于莫维斯线。上世纪50年代,围绕着丁村旧石器工业的性质展开了一场讨论。1956年,贾兰坡指出丁村遗址中两面制作的石器从制作方法和器形都与手斧相合,沙女沟附近采集的一件手斧和欧洲、非洲以及东南亚各

地所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后一阶段的阿舍利文化期的手斧相当。他还列举了周口店第1地点、第15地点和宁夏水洞沟地点的类似标本^⑭。但在1958年裴文中和贾兰坡合著的正式报告中,除将沙女沟采集的归为“似手斧石器”外,其余的都归为多边形砍砸器类。并认为“似手斧石器”在外形上虽近似,但因是采集品,且仅1件,故不能将丁村文化与欧洲的阿舍利文化相比^⑮。当时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发表了对丁村文化的看法。如布日耶认为其中的一些多边砍砸器应改称手斧^⑯。芝加哥大学弗里曼(L.G.Freeman)认为丁村手斧属于标准的阿舍利系列,存在的变异亦处于可预想的范围之内^⑰。

1983年,韩国学者李先富(Seonbok Yi)和美国考古学家克拉克(G.A.Clark)根据东北亚地区新发现的一些旧石器遗址如丁村遗址、韩国全谷里遗址以及贾兰坡先生提出的“华北两大系统”新学说,对莫维斯线正式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东亚地区旧石器早期的文化是复杂、多样的,也有一定数量手斧的存在,莫维斯简单的分类方案应该被抛弃^⑱。当时很多西方学者却对其观点持否定态度。也许受其影响,加上与西方学术界交流的加强,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到了对莫维斯线的讨论和质疑中。戴尔俭考察了阿舍利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后,认为中国零星的手斧不能标志来自西方的影响,关于东方远古人类和文化保守、落后的说法不符合事实^⑲。1987年,黄慰文先生在此前发表的旧石器材料中辨认出了多件手斧,并将其分为汾渭地堑、汉水谷地、百色盆地三个地区。提出旧石器初期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把旧石器初期世界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观点不符合客观事实^⑳。此文再一次在中国引起了关于莫维斯线的热烈讨论。林圣龙先生对辨认出来的其中九件手斧标本重新进行了研究,他依Clark, Kleindienst和Issac的标准,对器物名称作了定义,依此得出的结论是:除沙女沟标本为似手斧石器外,其余的几件标本应归入镐、三棱镐、多边砍砸器或石核斧的范畴。认为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像典型的阿舍利手斧那样的石器,即使不是完全缺乏,也是十分稀少的。至少就中国的材料而言,莫维斯的理论仍然是适用的^㉑。其后,林圣龙也对百色地区的手斧进行了个案研究,都将其归入砍砸

器,似镐石器或石核斧^⑨。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广西百色盆地由于新的发掘又有较多新的发现。侯亚梅等中美学者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其成果^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掘者对这些似手斧年代的推定。他们根据遗址中手斧与陨石的共存,通过测定陨石的年代而判断遗址中手斧的年代为距今约80万年。他们认为百色遗址的石器技术具有所有阿舍利技术的特点。其石器组合在石器打制能力、剥片策略和空间分布模式上都与阿舍利相似,表明莫维斯线东、西两边均具有相同的技术、文化和认知能力。但是这个遗址的年代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⑪。基于百色盆地的发现,侯亚梅、黄慰文认为东亚早期人类的文化发展进程与西方同步的事实,冲击了西方流行的“莫氏线”理论的基础^⑫。其后,黄慰文进一步认为西方旧石器文化的标志性技术和工具,在相应的中国旧石器文化中都能看到,且成序列地以成套工具的形式扮演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角之一。这种特性使旧大陆两侧的旧石器文化连成一体,难分东西^⑬。

这时期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陕西洛南盆地旷野遗址中所出土的手斧。发掘者王社江认为以重型石片石器和砾石工具为代表的石器工业面貌与西方的阿舍利工业相似,证实了手斧等阿舍利工业在远东的存在。同时他提出一种假说,认为这些手斧是西方古人类带着阿舍利文化的工具和技术向东迁徙,他们直接携带的工具就是现在东亚境内发现的零星似典型阿舍利手斧^⑭。

而有学者在综合考察了发现于非洲、欧洲、西亚和东亚的旧石器时代初期考古遗存后,从更高的层面和角度指出早中更新世旧石器文化的变异是一个全方位的现象,并非只在东西方之间存在差别。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文化不应该简单地被所谓的“莫维斯线”割裂为东西两个世界。东方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并不是单纯、简单和一成不变的砍砸器或石核——石片工业,西方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也不是阿舍利文化的一统天下^⑮。

近年来,也陆续有西方学者对东亚地区的手斧进行探讨。Schick认为中国的手斧虽具有两面器的性质,但这些技术和西亚、欧洲的阿舍利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没有西方典型的两面去薄技术,也

没有阿舍利技术中的那一套技术过程或程序。因而东亚地区不存在手斧^⑯。Norton等对朝鲜半岛Imjin/Hantan河流盆地(IHRB)的4个旷野遗址中发掘或调查所获得的手斧,与非洲肯尼亚Olorgesailie遗址、印度Hunsgi-Baichbal遗址和中国丁村、百色遗址中的材料,进行了比较研究。四个地区的手斧在长度、宽度等属性数据上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别,但是朝鲜半岛和印度、非洲的手斧在厚度上有显著差别。因而认为莫维斯理论仍然是可以支持的^⑰。但Petraglia等则提出了不同看法,通过对朝鲜半岛、中国洛南盆地和百色盆地所发现的手斧与非洲、中东、印度和欧洲的阿舍利资料进行比较,在分析一系列石器属性测量数据后,认为在莫维斯线以东和以西的手斧与薄刃斧之间的数据是互有重叠的,因而它们在形态上并没有差异^⑱。其后Norton作了回应,澄清并没有否认东亚地区发现的手斧与莫维斯线以西的发现具有相似性。但仍强调:东亚所发现的手斧占石制品总量比例很小,大部分与典型的阿舍利不同;与东非和印度相比,出现含手斧的遗址频率非常低,在遗址中手斧所占石器总量的比例也低于印度和东非同时期的遗址^⑲。

三、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区域性及成因

东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从早至晚是具有特殊性似乎是目前大部分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对这种现象的存在,从莫维斯线提出的那时起也就有了各种解释。

1969年,莫维斯对他提出的学说成因作了解释:1. 东亚地区处于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边缘地带;2. 东亚地区劣质的石器原料限制了该地区石器文化的进步^⑳。很显然,他的这种“东方的石器文化是落后的,没有进步可言的”的观点是此后长期为人所诟病的重要原因。但1978年,他即放弃了该观点,转而强调与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相关性^㉑。博尔德也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是缺乏合适的燧石原料和利用植物资源如竹子等^㉒。此后,西方很多学者也从旧大陆东西两侧地理环境的区别和阻隔^㉓、早期人类文化传播过程中的技术的自然遗失^㉔等方面来进行解释。

如上述,中国学者对中国与西方旧石器文化的显著区别及原因也一直关注。裴文中、贾兰坡先生

就指出了中国旧石器文化不同于西方旧石器文化的特点,但对原因并未有过多的阐释。裴文中先生仅提及“由于制造工具所采用的原料不同,由于欧洲、亚洲的不同人类,要从工具本身来表现欧亚之间旧石器文化的更详细的关系是不可能的。^{④7}”将差异从原料和人种方面进行解释。

上世纪90年代,张森水指出中国北方旧石器主工业在旧石器早、中期看不到文化交流,与西方旧石器工业相比,其发展显得缓慢的原因是继承性影响创造性,原料质劣影响技术发挥和缺乏文化交流有碍工业发展^{④8}。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理念的发展,对此则有更深入的认识。王幼平认为更新世早、中期中国古环境的特点是最基本的因素。喜马拉雅山与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带来的强烈的环境效应使得东亚地区形成的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是构成华南及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特点产生的背景。青藏高原的高寒区与西北的干旱区形成原始人类迁徙的巨大屏障,严重限制旧大陆两侧人类及其文化的交流,使得从旧石器早更新世末期以来旧大陆两侧的旧石器文化沿着各自的道路发展,形成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④9}。不过,区域性的特别是中更新世阶段旧大陆整体文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很难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而更可能是各地生存环境导致的不同适应模式^{⑤0}。高星等从人的能动性适应生存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古人类“综合行为模式”,这是中国古人类在长期的适应生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适合本地区生态特点的生存方略。古人类因地制宜,与生存环境保持和谐与友好,以不断的迁徙移动实现对生存资源的浅程度开发,并对间或渗透的外来文化产生改造和同化的作用。由此而使中国乃至东亚的古人类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直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保持了行为和技术的连续性和稳定性^{⑤1}。

四、手斧:认识与思考

在中国旧石器早期石器工业的认识和探索中,手斧被给予了超乎寻常的目光。目前中国手斧的发现集中在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口水库三个地区。其余地点则只有数量几件的零星发现。综合学者的各种观点,我们对中国手斧有以下几点初步认识:

1. 中外学者多数都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存在有手斧。但对于其究竟是从西方传播,还是一种技术的趋同现象,有不同的看法。最早提出趋同的是博尔德,他认为在巴芝丹文化的似阿舍利工业只是表面现象,是一种文化的趋同^{⑤2}。Petraglia也认为百色盆地、朝鲜半岛似阿舍利传统在石器组合上的相似性是技术趋同所形成的^{⑤3}。Shick认为中国的手斧只是似乎代表了出现在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较晚时的某种真实的技术发展,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发明^{⑤4}。博伊德认为尽管在中国找到的数量稀少的阿舍利文化并非外来文化的革新产物,而是对其固有技艺的再创新的结果,可能是本土早在数十万年前自生的两面加工石器现象,与非洲的迁徙无关^{⑤5}。中国学者戴尔俭、安志敏等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手斧是本地的产物,为“原手斧”^{⑤6}。

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些发现的手斧是带这种技术的古人群从西方传播而来的^{⑤7},或认为中国与西方从旧石器初期开始直至晚期,古人群之间的交流就是不间断的,东西方具有相同的技术传统正是由于古人群多次横贯大陆的双向迁移、交流与融合的结果^{⑤8}。

2. 关于这些似阿舍利技术的手斧是否可以归为阿舍利传统技术,还存在不同认识。Klein认为在东亚地区遗址中虽含有似手斧的双面器工具,显示了中国直立人能够生产相当娴熟的石器工具,但这些手斧均与典型的阿舍利手斧不同,它们并没有显示阿舍利传统侵入中国^{⑤9}。Corvinus认为在东亚所发现的“手斧”分布零星,这种呈尖状的偶尔双面加工的工具是中国内部砾石工具传统中偶尔的成分,中国旧石器遗址中没有直接可以和阿舍利传统相联系的^{⑥0}。相反地,王社江认为包括洛南盆地在内的中国似阿舍利手斧虽然存在变异,可这种变异是世界范围内的现象,因此可以将其归入阿舍利传统^{⑥1}。Petraglia认为洛南盆地的石器组合与阿舍利工具形态的变异范围很相符合(仅略厚,少精加工)因而同意王社江的意见^{⑥2}。从石器技术及形态层面来说,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手斧中,洛南盆地的手斧与西方典型的阿舍利手斧最为接近,其余地点的手斧应仍多属于“原手斧”。

3. 关于含模式 技术的因素在中国旧石器文

化的地位,大部分中外学者认为含似阿舍利手斧的遗址数量在东亚地区很少,遗址中手斧在石制品总量中所占比例均很小,手斧与西方早期的粗制手斧虽较为相似,但与典型的手斧差异较大。因而莫维斯线在事实上反映了东西方在技术传统上的差异。

4. 中国手斧最重要的年代问题还没有被接受和解决。

以上这些初步归纳是我们继续探讨中国手斧问题的基础。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中,我们也看到,对中国旧石器石制品分类体系和器物名称术语一直以来是比较大的问题。很多的器物名称并没有比较清楚的解释或定义,不同的遗址和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在研究手斧问题中就表现了出来。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对术语进行较好的规范,以有利于学术交流和探讨。在对器物的研究,除了传统属性测量和比对外,我们也应该提倡技术——认知学这种新的视角,加强对石器技术体系的研究,从操作链的角度,探讨石器形态变异与功能、原料、再使用、再修理和制作者水平等各方面的关系;加强石器的实验制作和功能分析研究。我们更应该超越有关形态、类型方面的表层现象,探究器物背后人类的认知能力,探索手斧生产与使用背后的区域性人类行为和文化适应性,进一步阐述莫维斯线的真正内涵。

近百年的旧石器考古发展,也让我们欣喜地看到对莫维斯线的讨论已经从当时带有狭隘的民族感情和偏见的认识逐渐转变成今天的这样一个开放的学术问题。我们对于莫维斯线的探讨也从质疑、挑战逐渐转向更深入地人类行为和生存策略的探寻。张森水先生曾评述“莫维斯旧大陆旧石器时代前期文化区划理论,尽管国内外考古学家持有一些不同看法,但从历史角度看无疑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两个群体说从更大空间阐明旧石器时代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若从目前旧石器时代前期成果看,无疑是简单化了”^③。

对莫维斯线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石器工业面貌,而且牵涉到对整个旧大陆文化发展与人类演化整体格局的认识。我们要联系整个世界人类起源与扩散的过程进行观察,把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古人类要重视考古证据所提供的行为和文化模式,考古学的解释最终也要

在整个人类体质变化和人口迁移和扩散的模式中去理解。

注释:

Teilhard de Chardin, P. and W. C. Pei 1932: The lithic industry of the Sinanthropus in Choukoudien, Bull. Geol. Soc. China, 11: 315~364.

①、⑩、⑪ 裴文中:《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⑫ 裴文中:《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学报》1972年第1期。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

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

邱中郎、李炎贤:《二十六年来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年。

⑬ 张森水:《中国北方旧石器工业的区域渐进与文化交流》,《人类学学报》9卷第4期,1990年。

⑭ 贾兰坡:《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⑮ 房迎三:《试论我国旧石器文化中的砍器传统》,《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

⑯ 黄慰文、张镇洪:《中国南方砖红壤中的石器工业》,《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

⑰ 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8卷第3期,1999年。

⑱ 王幼平:《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类型及成因》,《东北亚旧石器文化》,1996年。

⑲ 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5卷第1期,1996年。

⑳ Clark J. D. The Acheulean industrial complex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In: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S. C. Robert., L. C. Russell, ed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94.

㉑、㉒、㉓ Schick K. D., Dong Z. Early Paleolithic of China and Eastern Asia.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1993.

㉔ Teilhard de Chardin P. Les recents Progres de la Prehistoire en Chine. L'Anthropologie, 1935.

㉕ Movius, H.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 and East Asia . Paper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3),1944.

Movius H. The Lower Paleolithic culture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38(4),1948.

②③ 贾兰坡:《在中国发现的手斧》,《科学通报》,1956年,第12期。

②④ 裴文中、贾兰坡:《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②⑤ Pei W C. Professor Henri Breuil, Pioneer of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its progress after him. In: Mesclanea en Homenaje al Abate Henri Breuil. Vol.2. Barcelona: Diputacion Provincial de Barcelona.1965.

②⑥ Freeman L G Jr.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 In: 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 W Howells, P Tsuchitani eds).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1977.

②⑦ Yi S and G. A. Clark. Observations on the Lower Paleolithic of Northeast 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24(2), 1983.

②⑧ 戴尔俭:《旧大陆的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系统》,《人类学学报》4卷第3期,1985年。

②⑨ 黄慰文:《中国的手斧》,《人类学学报》6卷第1期,1987年。

③⑩ 林圣龙:《对九件手斧标本的再研究和对莫维斯线理论之拙见》,《人类学学报》13卷第3期,1994年。

③⑪ 林圣龙、何乃汉:《关于百色的手斧》,《人类学学报》14卷3期,1995年。

③⑫ Hou Yamei, et al. Mid-Pleistocene Acheulean-like Stone Technology of the Bose Basin, South China.Science 287, 1622 .2000.

③⑬ Christian Koeberl, et al. Tektites and the Age Paradox in Mid-Pleistocene China. Science 289, 507a . 2000.

③⑭ 侯亚梅、黄慰文:《关于旧大陆早期人类文化发展格局——百色手斧挑战“莫氏线”》,《中国科学院院刊》,2001年,第1期。

③⑮、③⑯ 黄慰文:《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与早期人类文化进化格局》,《人类学学报》28卷第1期,2009年。

③⑰、③⑱、③⑲ Wang S. Perspectives on Hominid Behavior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A study of the Lower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Luonan Basin, China . Oxford: Archaeopres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406,2005.

③⑳ 高星、欧阳志山:《趋同与变异:关于东亚与西方旧

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比较》,《演化的实证:纪念杨钟键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海洋出版社,1997年。

③㉑、④⑥ Schick KD. The Movius Line Reconsidered: Perspectives on the Earlier Paleolithic of Eastern Asia. In: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S C Robert., L C Russell, ed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94.

③㉒ Christopher J. Norton et al..Middle Pleistocene handaxes from the Korean Peninsul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1.2006.

④⑩、⑤③、⑥② Petraglia, M.D., Shipton, C., Large cutting tool variation west and east of the Movius Line. J. Hum. Evol.2008.

④⑪ Christopher J. Norton et al. The Movius Line sensu lato (Norton et al., 2006) further assessed and defined J Hum Evol .2008.

④⑫ Movius H. Lower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Southern Asia and the Far East. In: Studies in Physical Anthropology, No.1.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1969.

④⑬ Movius H. Conclusion. Early Pal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Hague: Mouton.1978.

④⑭、⑤② Bordes, F.Foreword. Early Pal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Hague: Mouton.1978.

④⑮ 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⑯ 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④⑰ 高星、裴树文:《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与生存模式的考古学阐释》,《第四纪研究》26卷第4期,2006年。

④⑱ Eric Boeda: 《旧石器时代东亚、西亚之间的关系》,《第四纪研究》24卷第3期 2004年。

④⑳ 安志敏:《中国的原手斧及其传统》,《人类学学报》9卷第4期,1990年。

⑤① Klein RG. The Human Career: Huma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⑤② Gudrun Corvinus. Homo erectu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questions of the age of the specie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tone artifact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andaxe-like tool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117 . 2004.

⑤③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考古中的几个问题》,《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